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化项目

转型时期利益群体的分化 与道德整合

项目批准机关：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项目批准号：95CKS01002

项目负责人：葛 坤 英

项目参加人：俞海洛 王建国 顾成敏

葛 飞 岳银芳 肖明宪

薛 飞 顾成玲 马宜章

项目完成时间：二〇〇〇年九月

转型时期利益群体的分化与道德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社会转型是体制转轨提出的直接要求,也是实现体制转轨的最终保证。在中国,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社会体制的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历史上看,实现社会转型,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通过革命手段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制度,完全实现新的社会体制,即突变式转型;二是在社会根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逐步从原有的社会体制中培育出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即渐变式转型;三是一种社会体制通过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支付高昂的改造费用,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另一种社会体制改变成与自己相同的体制(如原西德改造原东德),可称为赎买式转型。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只能走渐变式转型这条路。相比较而言,突变式转型和赎买式转型,都带有强制性,各种社会矛盾虽然尖锐,但解决起来会又快又彻底。而在渐变式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又多又复杂,解决起来难以分清轻重缓急。而且,不少旧的矛盾本来就难以解决,还会在旧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冒出一些新的矛盾。要实现社会转型,回避矛盾当然是不对的,也是行不通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解决矛盾的好环境。这就提出了社会稳定的要求。渐进式转型是在社会平稳运行中实现的,剧烈的动荡就不成其为渐进式转型了。平稳过渡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中国目前社会转型的实现要求来看,稳定的社会全局,还不仅仅是为了平稳过渡到新的社会体制,更在于没有这种平稳过渡,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不可能如期成功,社会主义制度也谈不上巩固和完善了。

为了对转型时期由社会结构的变动引发的社会分层秩序的变革和随之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我们采用抽样调查的方

式,在社会各职业群体中进行了认真和广泛的调查。课题组的工作分四个阶段:①课题分解与课题调查问卷设计阶段。通过多次讨论,分析了当前现实社会的道德状况、性质及发展趋势,确定了课题研究的总体构想;②问卷调查阶段;③问卷资料的分析工作;④课题综合报告的撰写工作。此次调查共发问卷1200张,收回有效问卷1158份,回收率96.5%。在这次社会调查中,我们努力做到了四点:一是调查内容全面,重点突出;二是社会各行业涉及面广,分布均衡。它包括工人(16.1%)、农民(17.1%)、学生(17.9%)、科技人员、教师、干部(20.06%)、市民(12.44%)、个体和私营企业主(16.4%),除军人外,基本涵盖了社会主要职业群体;三是回收率高,可信度强。为了搞好此项调研,我们专门聘请了一批责任心和能力都较强的大学生做调查员,认真对他们进行了思想动员和技能培训。几个月来这些调查员深入社会各职业群体之中,采用各种形式进行直接有效地调查问卷,收到良好效果;四是认真细致地统计调查数据,使其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可以说,这些问卷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人群对社会所存在问题的真实想法和心态。报告共分四个部分,即:1. 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现状;2. 群体分化中的道德失范现象;3. 道德整合的内涵;4. 道德整合的方式及途径。报告的主要思想可简要表达如下: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引发社会分层秩序的变革。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艰难,文化支援滞后使得社会分层在规范与不规范间运作。富裕与贫困群体的分化致使社会成员间贫富差距较大,种种社会问题随之产生深远影响。我们通过地社会群体分化与道德规范互动关系的论述,阐明了道德整合的必要性。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稳定发展所赖以依靠的道德框架,并力图提供给人们一个在精神和行为上可以共守的整合模式。

二、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现状

在对此次调查问卷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当今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1. **社会分化加速,形成显在的贫富群体。**在社会各群体中对当前社会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调查时,被调查者主要有以下一些基本看法。

1) 对政府有关贫富政策的导向持基本肯定态度。52.33%的人认为它“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32.13%的人认为它“使贫富差距拉大”,15.54%的人认为它“在执行中是失败的”。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关贫富政策得到了社会上多数人的理解和肯定,而“使贫富差距拉大”是此类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且应该出现的状况,否则怎么能达到“先富带动后富,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呢?还有少数人持否定态度,也是不奇怪的,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十全十美,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同时,出现此类看法也与我们所调查的人群的职业和文化水平有关,如占调查总人数的45.7%的农民、市民和工人群众往往注重事物的表面现象,直观性较强,而忽视了从理论上去认识问题。

早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十五大继续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思路,提出两个“允许和鼓励”,一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二是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急剧向个人倾斜。个人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0.5%迅速上升到1997年的80.9%,而国家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由1978年的31.6%急剧下降到1997年的14.1%(李欣欣,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N],中国经济时报,1990-07-13。)。在我国巨大的个人收入中,一部分人因为处在好的行业或从事特殊的职业而占有其中较大的份额,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先富群体。所谓先富群体是相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先富”的标准是动态变化的;先富群体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人群组合。但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定义尺度来衡量,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先富群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先富群体的存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都正在并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言而喻,我国先富群体对社会消费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先富群体的人数虽少,但人均收入高。人均拥有的财富占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更高,同时其财富的增长率高。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1998年,占城镇居民2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年收入10962元,占2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只有2447元;最高收入层是最

低收入层的 4.5 倍。占城镇居民的 10% 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比 10% 的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高 5 个百分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同样存在着比较悬殊的差距,其财富的集中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意味着低收入居民不仅在收入数量上与高收入居民有着悬殊的差距,而且其收入增长慢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

再看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情况。据统计,到 1998 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 53407 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1999-02-27。)。高额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成了众商家制订各种营销计划的出发点,成了政府及社会各界启动消费的希望所在。但是,据专家分析,这 5.3 万亿元存款中,约有 1 万亿是“公款私存”,1 万亿是农村储蓄。此外 3 万亿元中约有一半被 20% 的城镇高收入户占有,其余一半分散在 80% 的储户中,有 20% 的低收入家庭户均存款不足万元。(杨庆兵,启动消费的难点在哪里[J].半月谈,1999,(13)。)由此可以看出,存款总量虽多但人均多寡差别很大。根据近期城镇居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3% 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 47%,另外 97% 的中低收入者占有储蓄存款的 53%,我国的财富分配呈现出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各占半壁江山的格局。

2) 重视个人能力在贫富群体分化中的作用,但对这种“能力”的内涵多持贬抑态度。在问及当前社会中贫富群体产生的原因,52.85% 的人认为是由于“个人能力不同”,27.81% 的人认为是“政府政策导向”,26.6% 的人认为是“分配不公”。但对“个人能力”的内涵却并不全是褒奖,在回答“您认为目前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时,37.31% 的人认为“不太多”,26.42% 的人认为“极少”,19.86% 的人认为“很多”,18.19% 的人回答“不知道”。这样,对富者为正当手段致富持基本否定态度者约为 63.73%,而在持肯定态度的 19.86% 的比例中,除去社会公认的致富群体——个体和私营企业主(16.41%)本身对自己的肯定比例数外,在社会上其它群体中对致富者的手段和途径的正当性给予肯定的仅有 3.4%。而在“问及当及社会中是否存在“为富不仁”的现象时,46.8% 的人认为“现在依然如此”,46.12% 的人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仅有 7.08% 的人认为“现在已经过时”,也就是说,有约 10% 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主对自身所置的先富群体中具

有的个体思想素质和修养也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为什么社会众多社会群体对先富群体持贬抑和反感的态度呢？除去对先富群体致富的手段和途径的不赞同外，也和先富群体在致富后中不能合理消费现状有关。合理消费是指公民用于自身合乎社会道德伦理要求、价值取向和制度要求的生存、发展、享受资料的消费，而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败坏社会风气，损害人们正常社会关系，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消费，如腐败关系消费、炫耀型消费、挥霍型消费、奢侈糜烂型消费、封建愚昧型消费等应属于不合理消费。其中尤其令人注意和反感的是关系消费，因为它直接侵犯和危害了社会其他群体的直接利益。所谓关系消费是为了建立和维持所需的特定社会关系，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资本增殖优势和信息优势而产生的消费行为。这种消费以钱或物的赠与、以高额支出的娱乐等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或利益。这种消费在先富群体内表现更为明显。

说到关系消费不能不提及权力与财富的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有些人本来就是凭借权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方式获得财富而成为先富者的；而更多的人则是在有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之后，会千方百计地追求、攫取各种权力用以保护即得利益；这两者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达到权力和财富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它将寻求某种关系垄断——即在一定的区域内或在一定的行业内寻求一种没有监督和制约的特权。有了这种特权就可以顺畅地、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为了实现和巩固关系垄断局面，关系消费应运而生。

关系消费是产生行贿受贿行为的有力动因。它对社会肌体具有极强的腐蚀作用。在我国“权”、“钱”互为依附的观念根深蒂固，权钱交易屡反不掉的背景下，更要密切关注并努力消除关系消费。

闻名全国的湛江走私案中所揭露的问题生动地说明了如何通过关系消费达到关系垄断。走私分子张猗、李深等为打通湛江海关这个“通道”，1996年至1998年期间用于前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身上的关系消费就达200多万元人民币。由此，在同一期间张猗、李深所办的“湛江技术开发区中正贸易公司”垄断了湛江海关几乎所有的走私报关“业务”，偷逃国家关税达4.2亿元，成了名震一方的“报关大王”，真正做到了“关系垄断”。

因此,如何鼓励和引导先富群体的正常合理消费,遏制其不合理消费,是应当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的问题。

3) 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是导致贫困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

对于“您认为改革中收益最多的群体是(仅限三项)”“一题的回答顺序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77.37%),演艺人员(76.15%),三资企业员工(51.47%),科技人员(33.51%),国有企业工人(5.01%),农民(4.84%)。而在问及“您认为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时,37.82%的人认为是“失业下岗”,23.83%的人认为是“企业效益下降”,27.46%的人认为是“负担过重”,31.43%的人认为“个人能力不高”,15.89%认为是“物价上涨”。

从以上测试结果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当今社会中贫富群体的界阶分明,在这里的富者,指的是合法发展,劳动致富者。它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少数企业经营承包者;文体明星;外企资方代理人等等。贫者则是指在社会上仅能维持正常生活水平或略高于此的人。它包括因体制改革而下岗待业的一部分工人、职员;一般的工薪阶层;城镇居民低收入者;农村低收入者等等。由此可看出,今日贫富之分的特殊点:在于两者的政治差距小,经济差距大,即往往体现在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而非社会地位高低、学历和知识多少之分。而他们所具有的道德状况和发展趋势,则必然会对当前和今后的市场经济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影响。二是致贫原因首推“失业、下岗”(37.82%),还有“企业效益下降”(23.83%)和“物价上涨”(15.89%),而这些原因都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和国企改革有关。由此可看出,让贫者致富,不仅仅在于“让先富者带动后富”,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均衡、持续地向前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生活需要。

4) 取缔非法收入,加大扶贫力度有益于抑制贫富差距

对于“如何抑制贫富差距”,41.45%的人认为应“取缔非法收入”,41.11%的人认为应“加大扶贫力度”,28.84%的人认为应“调节过富收入”。在谈及“您对政府扶贫政策的评价”时,27.46%的人认为它是“形式主义”,43.18%的人认为它“效果有限”,28.32%的人认为它是“缩短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人们在对待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意见较为集中:一是明确划分了做此项工作的三个层面:扶贫、抑富、打击非法收

入,且对三项工作的比重持均衡态度。二是在社会群体中具有一种要求“共同富裕”的强烈愿望。三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政府的扶贫政策持失望态度。即对政府在有效地、迅速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却没有拿出有效的政策和措施让大家共同富裕感到困惑和不满。

2. 社会冲突加剧,呈现多元状态。社会转型必然加剧各类冲突,我国也不例外,在调查问卷中,就“当前的社会冲突产生的原因”,61.83%的人认为是“政府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23.49%的人认为是“新旧经济体制的冲突”,19%的人认为是“贫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16.58%的人认为是“道德伦理淡漠”,在此主要谈谈社会贪污腐败问题和道德教育弱化和滞后的问题。

1) 社会贪污腐败是导致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推动经济发展需要解决许多问题,其中,政府腐败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在本次调查问卷中,有高达61.8%的人认为“政府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导致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就隐喻着对政府存在的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在问卷中,“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仅限三项)”试题的回答中,83.07%的人认为是“腐败问题”,63.9%的人认为是“失业问题”,56.99%的人认为是社会风气问题。在问及“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重要因素”试题时,56.65%的人认为是“腐败现象的有效遏制”,25.91%的人认为应“加强社会公德教育”,23.39%的人认为应“克服行业不正之风”,21.42%的人认为应“建立重罚制度”。在谈及“银行储蓄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的作用时,64.94%的人认为它“有效地抑制贪污腐败”。

从以上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问题:

(1) 在当今中国社会,政府中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已成为我国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大障碍,也是广大社会民众最为痛恨的现象。它提醒各级政府领导人,必须正视和关注这个问题,并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变,以改善政府形象,树立威信。

(2) 广大社会民众在强烈抨击某些政府官员个人贪污腐败行为的同时,也隐含着对“法人腐败”现象的揭示和反对。因为“政府”一词,往往代表着不同级别和类别的组织。所谓“法人腐败”是指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党政

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合法社会组织及其成员,为了谋取法人利益,在法人意志支配下,以法人组织的名义所组织实施的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腐败行为。我国法人腐败蔓延的经济原因之一就是部门和企业利益的明晰化和法律制约机制的不完善。因为企业改革经历了从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开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转变。这一方面使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了明晰,同时也使企业的自我利益意识得到了加强。这对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经济转轨时期缺乏必要的法律制约机制和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导致了企业行为的紊乱。一些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包括正当的和不正当的)的最大化,不惜采取不正当或非法的手段。可见,企业和部门利益的明晰化和强化是法人腐败现象产生和蔓延的内在因素,而法律机制的不完善则是促使其发生的外部条件。

(3)当前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大量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揭示了贫困与腐败二者之间的某种关系。即当国家和社会财富被某些人大量地据为己有之后,必然会导致民众和国家的贫穷,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也可以从当今世界上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例证。可以说,当今世界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腐败已经成为国际性难题,有关反腐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进入起步阶段。其明显标志就是“国际透明组织”的成立,它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专以反腐败为目的的一个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性的民间组织。自1993年它成立以来,在国际性反腐败中做了大量工作,其中自1995年以来每年发布的一期“腐败排行榜”已经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腐败排行榜”是将各国依其政府官员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腐败程度排列名次。值得注意的是,五期“腐败排行榜”中最廉洁的前三名国家基本固定为新西兰、丹麦、瑞典、芬兰等几个国民经济富裕的国家;而腐败最为严重的后三名国家则由尼日利亚、印尼、巴基斯坦、卡麦隆、哥伦比亚等几个贫穷国家轮流坐庄。中国曾在95年第一期“腐败排行榜”中被列为后三名之一,但后来名次逐年上升,说明了中国反腐败状况逐年有所改善。这个统计结果清楚地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许多世界上严重贫困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严重腐败的国家。它告诉人们,消除贫困不仅仅是要现代化和发展经济,还必须坚决有效地同腐败现

象作斗争。

同时,“国际透明组织”定期发布“腐败排行榜”的作法也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发。中国是否也应该考虑在国内建立类似的反腐败民间组织,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制约,让广大社会民众经常了解我国反腐败工作进行的状况和成绩,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以更加严厉和有效的措施,使我国反腐败的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2) 道德观念冲突加剧,解决问题待来日方长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们的道德变化和发展过程缩短,常常以突变和突发的形式出现。这种突变和突发所表现出的内容既有长期潜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综合因素的积累,也有现实环境刺激形成的随机性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往往使人不可思议或难以接受。在调查问卷中,当问及“您对我国目前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时,46.29%的人认为“不满意”,33.16%的人认为“尚可”,15.2%的人认为“说不清”,4.15%的人认为“满意”。对于在当今社会道德观上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36.61%的人认为是“价值观不同”,34.72%的人认为“自我修养各异”,24.01%的人认为是“时代观念不同”,22.11%的人认为是“生活方式不同”,10.36%的人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影响”。

对以上测试数据进行分析,有两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社会公众对当今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很低。有46.29%的人直接表达了“不满意”的意愿,再加上“尚可”和“说不清”中包括的一部分表达不满意的成份,就使得对目前社会道德状况持基本否定态度者达到了半数以上。这既表明了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存在严重问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出广大社会民众对此种现状的激愤和要求改变这种现状的愿望,同时也给我国各级政府和领导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二是在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状况下,社会公众正在日趋注重自身思想、素质的提高,在这里具体表现为大部分被调查者把道德观差异的主要原因归于自身观念和个人修养。从而为我们改善社会道德现状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方向。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在现代生活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生活质量,在回答“人生最重要的内容(限选三项)”时,78.58%的人认为是“健康”,70.47%的人认为是“事业”,38.34%的人认为是友谊,38.17%的人认为是爱情,而对金钱、权力和地位的选择率分别为29.19%、12.78%和11.23%。

在这里,把健康列为人生内容之首,把友谊即人际关系放在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观念上的重大突破。

对于“您认为目前通过道德教育促进社会稳定”的问题,51.12%的人认为“很有必要”,33.33%的人认为“效果不会太大”,6.22%的人认为没有效果。在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今日之作用进行调查时,53.37%的人认为“没有过时,应宏扬光大”,41.4%的人认为“应批判吸收,赋予新的内容”,6.08%的人认为“已经过时,应该摒弃”。由以上可看出,社会各群体对在社会转型期加强道德教育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对中华传统道德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将其列为现代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对“道德教育的主要渠道和方式”进行调查时,43.18%的人认为是“社会”,35.75%的人认为是“学校”,30.4%的人认为是“家庭”,13.99%的人认为是“社会传媒”。它说明多年来我们一直着力抓好的“教育大三角”(即学校、家庭、社会),在社会转型期仍然得到人们的肯定,保持着其重要地位,但对其教育方式和内容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即人们对新闻媒体持有一种离不开却又不信任的态度。当问及“您平常爱看的报纸”时,43.18%的人爱看“地方各类报纸”,39.21%的人爱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15.2%的人爱看“商报、证券类报刊”,9.15%爱看“地摊小报”。它表明了社会公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问题的思想倾向性,但与之相矛盾的是,相当一部分人对他们所看报纸的信任度较低。在对新闻媒体的报道信任度进行调查时,仅有35.41%的人“相信”,22.11%的人“不相信”,42.83%的人“无所谓”。做为我党和政府的宣传喉舌,新闻媒体在社会人群中得到如此评价,将极不利于它本身教育功能的发挥,应引起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及时的改正。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看出,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实践和道德建设都发生了较以往深刻的变化,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如市场经济的道德影响两重性的问题,贫富现象与社会稳定问题,抑制腐败与经济发展问题,现代人的信仰重建与信仰危机并存的问题,健全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体制、规范和标准问题等等。我们只有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造就出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顺利地完成社会转型。

3. 社会整合力下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众多。所谓整合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一体化程度。整合可以使社会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社会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分化与整合的平衡与协调。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异步必然使社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失序。一些社会成员利用不正当甚至非法手段占有社会资源,不仅使社会分层秩序由传统的不平等走向现代的不平等,而且加深了社会矛盾,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整合功能,离散了社会凝聚力,影响社会稳定。

对于“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的问题,42.49%的人认为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32.12%的人认为是“解决失业问题”,29.02%的人认为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26.94%的人认为是“缩小贫富差距”。它给了我们有益的启发,社会稳定既和人们的个体利益直接相关,又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联,这样,我们在力图提高社会整合力时,一要认真了解和处理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二要注意把握政策导向,尽快较好地解决当前社会中出现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三要关注和妥善解决大批人员下岗和再就业问题,它和人们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所反映出的“民心”,是我们经济能否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能否抓住它,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当今社会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它需要人们不断转换观念,推陈出新,这也是一个现代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对于在当前社会观念的变革,44.73%的人认为它“促进了社会进步”,32.12%的人认为它“标准太乱,难以接受”,11.92%的人认为“过于迟缓,影响社会发展”,11.57%的人认为它“速度太快,很不适应”。由测试结果可看出,虽然对社会观念的变革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较高,但持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的人的数量总和却略高于肯定者,且在它们之间也矛盾重重,它预示我们在加快社会观念变革方面将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搞好社会稳定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转型时期群体分化的道德失范现象

我们面临怎样的道德境遇?这是需要正视和解释的现实问题,也是重建工作赖以进行的前提。我们已经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和文化是

相对分离的,其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张力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到各自功能的发挥而不能达到有效的组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和文化被统合在政治之下,由于没有了间距,经济文化无法对政治发生反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和文化从政治的“怀抱”中分离出来,但却出现了经济和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疏离化倾向。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充分反映出,任何社会进步都不是经济内容的单方面突进,它需要科学文化知识为其基础,一定的道德伦理为其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推行确实引起了一定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是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所共同面对的跨世纪难题。可以说,我们的道德危机是双重的。当我们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我们除了要承受因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型而带来的道德变化之外,我们还和西方的后工业国家处在共时态的结构里,西方社会正在变化中的道德问题也同时地呈现给我们。这就使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预先地体验到了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因此,在现实的根基上,当我们试图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时,我们面临着三种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西方的、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三种文化价值体系的交融,使我们所面临的道德境遇具有了多元特点,而在当前转型时期较为突出地表现为道德失范现象。

(一) 群体分化中的道德失范现象种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利益群体和利益格局的逐渐分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带来人们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一方面人们由不平等走向平等,由人身依附走向人格独立,由重义轻利走向义利结合,由非主体性走向主体性,这是道德进步的主旋律。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133页)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

“道德失范”(disordered moral, anomie in moral)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混乱。道

德失范所揭示的是社会精神层面的某种危机或剧烈冲突。一般地说,道德失范首先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社会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而新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有有效影响力与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发生存在的意义危机,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在现象界形成社会规范的事实“真空”、缺失,呈现出某种紊乱无序。因此,道德失范以人们心灵中的意义系统危机为基本内容并表现为行为层面的越轨现象。当代中国的“道德失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价值体系紊乱。**(1)价值取向的多元并存与对峙。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市场经济和其它多种因素的影响,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受到严重冲击,国人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多元乃至紊乱状况。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性质不同,层次各异的价值取向:①社会本位价值取向(即民本位价值取向)。社会本位价值取向以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人们终身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原则。这种进步的价值观正在为绝大多数党员和一部分先进群众所尊奉和践履。是党和国家倡导的主旋律。②“官本位”价值取向(即权本位价值取向)。“官本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如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也”(《论语一卫灵公》)。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官本位”的价值主导地位开始动摇,但仍很有市场。“官本位”把做官掌握权力的大小视为人生唯一的最高价值追求。认为有权就有一切,其口头禅是“在中国只要做了官,就什么都有了”。在本课题的一项关于人生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的调查中,有 12.78%的人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内容是获取权利,说明在我国仍有一些人奉行权本位的价值观,“官本位”扭曲了人民公仆的形象,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取系,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③钱本位价值取向(即金钱拜物教)。这种价值观以金钱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尺度,奉行“金钱万能”,“一切向钱看”,钱本位价值观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舆论一度不适当地宣传拥有金钱的“潇洒”,“气派”等多种原因,导致相当一部分人陷入钱本位价值观的误区,本课题调研结果有 29.9%的

人把金钱当作人生最重要的内容。④欲本位价值取向(即享乐主义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把寻求感官享受当作人的本性,在他们看来人生目的就是“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其他的一切,什么理想、信仰、事业都无所谓。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追求享乐,穷奢极欲,醉生梦死。⑤个人本位价值观取向(即利己主义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强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的手段,割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片面极端地强调个人的地位和作用,表现为自我奋斗、损公肥私、损人利民、自私狭隘,自由散漫等。⑥合理利己主义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游离于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之间。就形态而言,具有暂时性、复合型、交叉型的特色。就政治意识角度看,这种转化过程中的暂时性、复合型、交叉型的特色又统一于灰色调,所以又称之为灰色价值观。这种灰色价观是蜕化型的,它是由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向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滑变。

以上六种价值取向基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人的价值观,但是这只是理论上一种分类,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的价值取向并不是以纯粹的某一种形态出现,而是带有很大的兼容性,如人们趋向于既讲人格完善,也要世俗享受;既讲精神追求,也重视功利实惠;既讲奉献社会,也重获得相应的回报等。

(2) 价值标准与工具原则的混同。市场经济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一切商品都以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市场经济关注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评价。这就容易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人,用经济评价取代道德评价,在各个领域作可实际操作和量化的评估。这些人把社会上的一切(包括人)都当作市场经济中的工具和商品,知识、才能、良心、爱情、友谊、权力、美色等都可以作为等价交换的对象,造成道德评价与经济评价,价值评价与工具评价的混同。十多年前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奋不顾身跳进粪池,为抢救掏粪老人而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这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来讲,本无可争议,是一种崇高的舍己救人的共义道德,它的死是值得的。但在市场经济以席卷之势冲击、浸染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时候,张华之死成了令人难解的时代难题。80年代在全国各界尤其是在大学生中间兴起了一场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人们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困惑了,那位老

人即使获救，究竟还能活几年，他还能创造多少社会价值？而一名硕士生的生命价值多么宝贵，国家为培养他用去了多少费用，他如果能健康的活着，又将创造多少财富，他的死“值”吗？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就是由于把张华的人生价值抽象化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工具性价值，从而与被救出的那位老人相比，显然得出张华的价值远远大于被救的那位老人的价值。其实价值原则与工具原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马克斯·韦伯指出，从价值原则来看工具原则或从工具原则来看价值原则都可能导致荒谬。张华抢救落入粪坑的老人是一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会赢得人们的赞誉，这种道德价值是无法用工具价值来衡量的。

（3）道德评价标准的迷茫与困惑。道德判断以及道德塑造，都需要依据一定的善恶标准。然而，就其现状来看，这种标准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混乱的。这一问题，在社会转型期会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标准、西方各种各样的道德标准、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交织杂陈。比如，有人宣扬奉献精神；有人主张“劳”“酬”一致（按劳付酬与按酬付劳的统一）；有人宣传大公无私，有人认为个人主义、合理利己主义才是市场经济的真正基础等。道德“滑坡论”与道德“爬坡论”之间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据以进行判断的道德标准有所不同。目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缺乏一种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普遍认同的、能够起到主导作用的道德标准系统，这种道德标准的混乱状况，必然造成人们尤其是青年人道德评价上的困惑，据一些调查得知，有些青年人在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界线是什么，产生疑惑，甚至对明显的善恶都分不清，有的青年认为自己必须帮助老板作黑帐，是为了全体职工的利益。（段跃：《中国青年人的十大伦理问题》载《中国青年》1995年第5期。）

伴随着价值标准和道德评价标准的迷失，人们对于千百年来人类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信念发生了动摇，产生了疑惑。比如，要不要区分君子与小人。有青年认为：“是君子，还是小人并不重要。做小人是技巧，是生存手段。……”为了生存什么手段都是可以采取的，不管道德与否。这一问题比起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似乎更加严重。当人们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仍在竭力分辨善恶的时候，表明人们还是在追求善，还保持着内心的良知。而当人们提出区分君子与小人、区分善恶并不重要的时候，就变成

了想取消善恶的界限。而取消善恶的区别就意味着不必讲道德。这是做人要讲道德这样一个根本信念的动摇。与此相关的困惑是很多的。比如：是为善好还是作恶好？做人要不要讲良心？要不要讲人格？要不要维护正义？要不要帮助别人……，这些千百年来形成的一些做人的根本道德信念，如今，在一些青年人心里产生了动摇，成了一种疑惑。

2. **社会心态的失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一场社会整体性结构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不仅深刻地改变着国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同时更强烈地震撼着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使人们的心理处在失衡、失范和失重之中。主要表现在：(1)道德感的冷漠。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曾经讲过，人具有四个“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个“善端”就是人的道德良知（即道德感）的四个方面。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人们交往方式的工具化、功利化，国人的道德良知日趋冷漠。“出门在外，见死不救，遇见不平，默默而行，歹徒行窃，视而不见，散财免灾，全家安康”。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咒语”和行为准则。遇到同胞溺水，发生车祸，少女遭流氓强奸，围观者黑压压一片，袖手旁观，麻木不仁，这种恻隐之心的失落的确世所罕见。如果说恻隐之心强调个人对他人的态度，那么羞恶之心则主要是指个人对自身言行一种感受和思考，是个人的尊严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将人类行为中的“贪”、“淫”、“偷”、“诈”、“拐”等视为“不轨”和羞耻。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却出现了不知羞耻的“厚黑流”，脸皮厚，心肠黑成了一些人升官发财的绝招和人生技巧，在他们被功利扭曲的心理天平中，羞恶之心已荡然无存。那么国人的辞让之心又如何呢？在我国五六十年代，人们的辞让之心浇灌出许多社会主义的文明之花。然而，辞让之心在今天似乎被人们淡忘了。我国公交部门曾对全国十大城市的“文明乘客”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大城市的乘客已失去了辞让之心，“挤”车“抢”座情况目之所及，比比皆是。辞让之心的泯灭，引起人际防范和人际隔阂，导致了人际关系冷漠。而是非之心，则是一种正义感，其渗透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和辞让之心等道德良心之中，又是各种道德良心得以“发现”的基础，以上种种行为都是是非之心泯灭的表现。有人对湖南怀化地区 702 名近来见义勇为的人员情况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由于是非之心的泯灭，人们的正义感的缺乏，导致好人有“三怕”。一怕伸张正